

這充分說明《台社》以議題激化討論與反省的強大功能。沒有錯，一百多篇論文的确形成了對台灣社會的部分基礎研究，對現階段的歷史發展也做了紀錄與理解。但是，未來的《台社》仍然必須以創造議題即時回應台灣內部問題為重心，可以

說，沒有議題就沒有《台社》，沒有即時回應就沒有《台社》的活力。

《台社》成功地探索了台灣的地域性問題，但是隨着外在情勢的發展，《台社》必然要思索如何成為華人世界的《台社》，這將是《台社》的進一步任務。

## 思為網醞 言乃不息

### ● 黃克武



1963年2月，台灣一群關懷時勢、熱愛學術的年輕朋友，共同創辦了《思與言》雜誌。根據「思與言雜誌社組織章程」，這一份雜誌的宗旨是「從事學術研究，助長文化滋長」。社友們就憑着這一簡單的理想，開創出一個寬廣而長久的學術天地。

《思與言》(台北：思與言雜誌社，1963- )

1963年2月，在《自由中國》停刊，雷震因「知匪不報」、「為匪宣傳」被判刑十年之後的兩年多，台灣學術界籠罩在一片沉悶的氣氛之中，一群關懷時勢、熱愛學術的年

輕朋友，共同創辦了《思與言》雜誌。早期創辦者有杜奎英、胡佛、許倬雲、張存武、文崇一、朱堅章、袁頌西、楊國樞、李亦園等人，他們多半擔任教職或學術研究工作。根據「思與言雜誌社組織章程」，這一份雜誌的宗旨是「從事學術研究，助長文化滋長」。社友們就憑着這一簡單的理想，開創出一個寬廣而長久的學術天地。

誠如李亦園先生所說的，《思與言》在台灣學術期刊之中是一「異數」。以一個學者們私人結合所創辦的刊物，竟能延續出刊三十八年，不曾中斷，而且至今仍具活力，這其實不僅是一個異數，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奇迹了。

此一奇迹的出現絕非偶然或天助，而是眾人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成果。三十餘年間，《思與言》不但沒有固定經費來源，也無專職員工。雜誌社的運作完全依賴社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在這方面我們不得

不提到自1989年開始擔任《思與言》發行人的何景賢，由於他在精神上與實質上的支持，《思與言》才能存活至今。此外，實際負責編務的何國隆也是該雜誌的靈魂人物，使雜誌編輯者無後顧之憂。另一方面，《思與言》則以內容的質樸純真、兼具深度與廣度來取勝，獲得讀者的支持。

在台灣眾多學術刊物之中，《思與言》除了以民間刊物的立場，表達獨立自主的精神之外，在內容方面也別具特色。這一本雜誌從開創以來就自我界定為「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其內容包括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哲學、宗教研究、性別研究等等。

這樣的定位有其優點，例如稿源充足、視野開闊等。然而也有缺點，這主要在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領域太廣，如果來稿領域過於分散，會讓讀者產生主題焦點不夠明確的感覺。以去年第一期的雜誌來說，所收的七篇文章有兩篇歷史學，一篇論二十世紀西方歷史敘述，一篇探討雷震的憲政思想。其他五篇則難以歸類，包括倫理學、城鄉移民、文化與病痛、文化參與、論時間等。這樣的缺點多次出現在《思與言》之上。文章過度分散所造成的一個較嚴重後果是：讀者多半只對其中的一兩篇感興趣，他們會到圖書館影印這幾篇文章，而不會購買當期雜誌，因而影響銷路。

為了彌補來稿學門過於分散的問題，也為了增加雜誌的銷售量，《思與言》的編輯群所採取的策略是積極邀稿編輯專號。在早期曾編過「環境與社會」專號、「人類學研究」專號、「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專

號、「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專號、「韋伯」專號等。近五年來專號更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編輯方針，基本上一年四期的刊物之中至少維持兩期散稿，兩期專號，有時甚至還編上三期專號。

近年來的專號，歷史學方面有「文化想像與族國建構」(1995:3)、「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清末民初的『國族』建構」(1998:1)；性別研究方面有「色情與社會」(1995:3)、「性批判」(1997:1)；宗教方面有「婦女與宗教」(1997:2)、「台灣與東亞宗教研究」(1999:2)；政治學方面有「政治共同體研究」(1999:3)、「現代國家」(編輯中)、「法治國」(編輯中)等。這些專號不但內容新穎，表現出台灣學界的活力，而且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科際整合。專號的主題逐漸地不以單一學科為限，而嘗試以問題取向，結合多種學科來探索同一問題。這一做法是化短處為長處。以「文化想像與族國建構」專號為例，收錄的文章包括歷史學、歷史教育、族群研究、文學、歷史人類學等。又如最近出刊的「政治共同體研究」專號，其中「台灣政治共同體」的對談會就邀約了法律學者、政治學者、歷史學者來共同探討此一主題。

第二，本土關懷。《思與言》一向是走「純」學術的路子，然而卻不認為學術工作只是象牙塔之內的自我娛樂。近幾年的專號，無論是對族群、宗教、性別議題的討論，都奠基於深厚的本土關懷，企圖對社會問題作一深層的學術反省。此一做法是延續了早期社友所提出學術研究的「中國化」與「本土化」的主張，而從事進一步的努力。

《思與言》一向是走「純」學術的路子，然而卻不認為學術工作只是象牙塔之內的自我娛樂。近幾年的專號，無論是對族群、宗教、性別議題的討論，都奠基於深厚的本土關懷，企圖對社會問題作一深層的學術反省。

第三，自我批判與反省。在各專號之中逐漸有一些文章開始對不同領域作學術史的回顧與反省。例如1999年第2期中有多篇文章討論兩岸宗教研究。1999年第3期一篇名為〈誰的政治思想？為何研究？：台灣政治學界政治思想研究之初步回顧〉的文章，對台灣學界，包括《思與言》在內的學術刊物對政治思想的研究提出質疑與批判。

在台灣雜誌銷售的市場上，《思與言》從來沒有叱咤風雲的熱賣場面，反而在過去十年之間，數

度出現經營危機，幸得發行人與編輯群的堅持才能持續至今，期盼他們能永續經營。經過長期的耕耘，《思與言》無疑已經在台灣學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未來要了解二十世紀後半葉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學者關懷點的變化、學術與社會的互動等課題，這一本雜誌將是最佳的時代見證。（本文標題「思為綱繆」、「言乃不息」二語採自林安梧先生〈思與言三十年總錄集編後跋〉一文，不敢掠美，謹致謝意。）

## 讓問題浮出水面

### ● 孫 歌

《學術思想評論》已經出版四輯，它顯示了越來越自覺的自我定位，這就是嘗試建立以學術為基本立腳點的思想立場。最令人注意的是從第一期開始就被排在最前面的「學術現象論析」，該欄目顯然意在倡導研究者對於自身問題能力的反省運思，以尋找那些真正能夠生長的問題。



《學術思想評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

在80年代的啟蒙話語裏，思想啟蒙被一種虛幻的中心意識支撐着，它使得知識界產生的最大錯覺就是認為知識份子可以利用自己的啟蒙話語直接改變社會。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種錯覺在進入90年代之後就不能再維持下去了，它促進了人們對於人文精神的討論，卻沒有引發對於思想與現實關係的追究，這是最大的遺憾。至今，在各種學術場合，我們仍然可以聽到人們談論知識份子要關注現實之類的觀點；而如何介入現實，思想與現實之間有甚麼樣的張力關係等問題，卻很少成為人們關心的對象。正是在這樣的知識氛圍之中，知識立場被最大程度地簡化了：它要麼是學